

中国对停滞的西方的多重影响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总是让人备感荣幸和愉快。遗憾的是，我今年不能亲自出席。就我个人而言，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亲爱的中国朋友们给我的温暖和支持让我深受感动。

就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有能力实现一些惊人的成就，如使 8000 万人摆脱贫困，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取得惊人成功，取得重大技术成就，以及现在有望恢复每年 6% 的 GDP 增长速度的惊人前景。相比之下，西方在同样的时间里无法实现其中任何一项成就。

我们看到，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展现出非凡成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和影响力引领的西方经济在过去几乎整整 50 年里显露停滞迹象。

然而，由于两国的规模和差异，可能存在这样的机会：中国给予美国一些东西，美国也给予中国一些东西。

我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注意到西方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过高（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成本高昂）的抱怨日益增多时。这种盈余似乎不仅是一种市场结局的结果——即中国人的储蓄倾向异常高，或是新冠疫情导致投资需求疲软，而且是中国央行设定高利率的结果。

然而，中美两国当然有可能进行谈判，以找到一种交换条件，使两国经济都变得更好——无论如何，正如两国政府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国做出所要求的让步，美国可以做出补偿。

中美经济之间另一个会产生某些成本的相互作用，是在台式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中，雇用中国工人生产中间产品。这一相互作用完全不

同于第一个，因为在这里，是中国市场给美国制造了问题，而不是中国政府。

分配中国工人生产中间产品的直接后果，是使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美国工人失业。此外，随着中国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行业出现劳动增加型技术进步，这些中间产品的供应继续增长。结果，这些中间产品流入美国，正在压低这些行业的工资。

同样，中美两国当然也有可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或一种交易方式，为美国政府与中国合作提供一种不仅仅对中国人进行补偿的方法。两国或许能够找到一种让双方都变得更好的方法——实现互惠互利。也许在实践中很难找到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机会。但我们可以肯定，确实存在一国的行业重组可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机会——无论如何，以某些标准衡量，确实如此。

但是，如果两国不进行协商，这种改善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两国不就对双方而言更好的资源分配方式交换意见，就找不到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资源分配方式。

现在，刚刚传出的消息表明，中美两国实际上都希望恢复良好的关系。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下周将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高级外交官杨毅。在上周三（3月3日）的一份声明中，布林肯说，这次会议将是一个机会，“坦率地陈述我们的许多忧虑……包括中国贸易惯例对美国工人的影响。

一方面，是中国的增长如何影响美国的话题。最初，大约40年前中国进入世界经济，本来有望会将资本投资从西方转移到中国。在微观经济方面，的确出现了一些这种转移，但总的说来，中国的经常账户有盈余，因为许多公司和富人——以及政府——都试图使财富配置多样化。（即使是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出于自身原因，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部分储

蓄，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做出了贡献。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帮助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

我问自己，中美两国将走向何方？如果中美都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美国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就不会下降到上个十年末（2019年）的低水平。美国储蓄的一大部分本可以分流为两部分，一些在美国投资，一些在中国投资，这样，资本就不会下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饱和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储蓄很少流向中国（而一些中国储蓄继续流向美国）

如果有足够的合作和相互信任来鼓励更多的美国储蓄来为中国投资提供资金，那么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将受益匪浅，而中国也会从中受益。我们都可以从更多的合作中受益。